

# 大众传播学

DAZHONG  
CHUANBOXUE

李 彬 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 大众传播学

李 彬 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传播学/李彬主编. -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7  
ISBN 7-304-01900-X

I.大… II.李… III.大众传播-电视大学-教材 IV.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68019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大众传播学

李彬 主编

---

出版·发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密云胶印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2.5 字数/378千字

---

版本/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

社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60号 邮编/100031

电话/66419791 68519502 (本书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

书号:ISBN 7-304-01900-X/G·526

定价:29.00元

## 流水前波让后波

——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在我国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其间虽然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传播学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研究生培养科目，使之成为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之一，更为传播学的腾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此书的问世，从大的背景上看也应归功于此。

不无巧合的是，这部全国电大教材的出版恰逢世纪之交。而更巧的是，另外两部全国性的传播学教材也在此时先后面世，这就是教育部“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系列中的《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系列中的《传播学概论》（吴文虎主编）。此时此刻，回顾传播学在我国的风雨历程，就有了别样的历史意味和蕴涵。

迄今为止，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辛勤耕耘，每一代人都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尽了自己的心力，在孜孜矻矻的探求之中，留下许多颇堪

回味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成果。

第一代的开山人物，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资深教授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教授为代表。曾做过燕京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的张隆栋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系刊《国际新闻界》时，就开始追踪方兴未艾的传播学研究。80年代初，他又在复刊后的《国际新闻界》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详尽介绍和评析传播学的长文。这组文章内容广博，材料翔实，脉络清晰，新人耳目，可谓第一代研究者给人印象最深的力作。与此同时，郑北渭先生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接连撰文，评述传播学，俨然与张隆栋先生形成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此外，曾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苑子熙教授、曾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的李启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的张黎研究员和陈崇山研究员等，均为“筚路蓝缕，以后山林”的第一代传播学研究者，为我国传播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如李启教授参与翻译的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今天看来译文虽然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但作为祖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权威译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其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第一代传播学人开天辟地诸般努力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数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发起（由此形成了以后历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均由该所主办的传统），会期3天<sup>〔1〕</sup>，参加会议的代表30余人，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和《新闻战线》杂志社等新闻教学、研究和实践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一大成果，就是明确了我们对传播学的基本态度，即后来广为流传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sup>〔2〕</sup>同时，会上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1〕 据《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刊发的《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徐耀魁、黄林）一文，会期是23~25日。而据《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年12月5日编发的内部材料《报纸动态》[82]第34期上的《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社科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供稿）一文，会期则是23~26日。

〔2〕 社科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刊《报纸动态》[82]第34期，4页，北京，《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12.5。

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性、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1〕

可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此后，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便开始全面展开，与此同时第二代传播学者也脱颖而出。

第二代多属第一代的学生，其中佼佼者有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范东升、曾执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陈韵昭（后来定居香港）和居延安（后来赴美留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的徐耀魁和现任该所传播研究室主任的明安香、曾任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吴文虎以及兰州大学的戴元光和浙江大学的邵培仁等。

与第一代的“重点进攻”相比，第二代的研究更像是“全面进攻”。也就是说，他们更加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再满足于草创阶段的“零打碎敲”。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登台授课，指点江山，议论风生，显示了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思想锐气。在这场向传播学领域发起的全面进攻中，有一些硕果至今令人难忘。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已改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这部1983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书籍，其中的10篇文章和3篇附录在传播学刚刚引入中国之际，对人们全面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陈韵昭先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开设的传播学选修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反响，她的讲稿深入浅出，活泼有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系刊《新闻大学》连载后深受欢迎。另外，由她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部为不少美国大学所采用的教材，内容通俗，讲解清楚，其作者之一坦卡德就是施拉姆培养的博士。这部较之《传播学概论》更加浅显实用的译著，出版后也是广受好评，对普及传播学知识、推动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功效。最近，我国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研究员郭镇之，又组织翻译了该书的第4版，名为《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除了纯粹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之外，第二代里一些受传播学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里，我们只提三部各有千秋的著作。一是

〔1〕社科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刊《报纸动态》〔82〕第34期，4页，北京，《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12.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 1993 年版),此书以精深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做了详尽而透辟的阐述,为我们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把握传播及传播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二是北京大学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龚文库教授的《说服学》(东方出版社 1993 年版),该书从说服的角度探讨了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观点新颖,资料翔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著。三是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的孙旭培研究员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这部书从传播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进行审视和梳理,提炼了一系列植根于本土文化的传播规律,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成功尝试。

如果说第一代的里程碑是 1982 年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那么第二代的成功标志就是 1986 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这是第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传播学会议,不仅代表广泛,人数众多,而且议题丰富,讨论热烈,从中折射出当时传播学研究如火如荼遍地开花的盛况。这次会议有两点突出的地方:其一是围绕吴文虎教授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框架体系而展开的深入探讨,由此显示了大家对系统理论的共同追求;其二是开始关注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王志兴(后来赴英留学),在会上提交了一篇关于批判学派的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

当然,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全面推进了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这次会议之后,传播学才在全国真正形成燎原之势。其主要表现一是各大学纷纷开设传播学课程,二是一批高水平的传播学译著接连问世。如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祝建华(后赴美留学获传播学博士学位)等翻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博士颜建军等翻译的《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张国良翻译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黄煜(后来赴英留学获传播学博士学位)等翻译的批判学派的《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等,就属其中著译俱佳的上乘之作,时至今日仍是人们研习传播学的经典。

不言而喻,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际国内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波,也给学术界带来波涌浪翻的激荡,传播学的研究同样如此。尘埃落定之后,学术界开始进行冷静的反思和积极的调整,整个学风由此发生了显而易见的转变:喧嚣浮躁让位于冷静沉潜,思想启蒙让位于学术建设。如果说 80 年代的学风是“热风吹雨洒江天”,那么 90 年代的学风则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就在这意义重大而悄然发生的转变过程中，传播学的第三代学人逐渐崭露头角。第三代与第二代的差异主要不在于年龄，真正隔开这两代的水火岭是知识结构与研究姿态。第三代基本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大学的，经过比较系统的专业学术训练，大都获得博士学位，有的还在国外留过学或做过访问学者，比较熟悉当代国际学术界的状况和趋势，具有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为系统的知识结构。

尤其是他们更倾向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姿态，在研究取向上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而不太愿意把学理同实用动不动就扯到一起。或者说，他们首先关注学术自身的价值，以及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关系，其次才考虑应用层面的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姿态固然有利于传播学学科的正规建设，进而启动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而从消极的方面看，有时也难免落入“象牙塔”中而与生动活泼日新月异的传播实践相隔膜。无论如何，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第三代研究者已历史性地肩负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

如果说第一代传播学人的贡献在于线上——开启一道门缝，第二代传播学人的成就在于面上——使传播学研究全面铺开，那么第三代传播学人的作为就在于点上——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举其要者，可以列出如下一些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喻国明，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舆论调查领域建树颇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在青少年与媒介的研究方面声誉卓著；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研究员郭镇之，专攻议程设置理论，与该理论的创立者之一麦库姆斯（Maxwell E. McCombs）交往密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教授张咏华，在大众传播社会学上取得了国内领先的研究成果；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系主任黄旦博士，对新闻传播学做了精深的思考；清华大学传播系留日博士崔保国，在信息与信息社会的研究上独树一帜；暨南大学新闻系留法博士陈卫星，对欧洲传播学的研究多有创获，他发表在 E《国外社会科学》上的长文《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后来被深受各界学人青睐的《新华文摘》所收录，成为该刊创办 20 年来刊登的第一篇传播学文章……有鉴于此，1998 年，以出版新闻传播学书籍而知名的新华出版社，甚至策划了一套“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其中已经收录或将要收录的选题，有的就属于这类在“点”上有突破的成果。

除了“点”上的突破之外，第三代在一般传播理论的研究上也向纵深推进不少。如李彬的《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段京肃、罗锐的《基础传播学》（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北京



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 版)、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和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版)等,都各具特色,广为流传,几乎成为当今传播学基础理论方面通用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尤其是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在迄今已有的众多同类书籍中,堪称体系完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述精当。正因如此,全国同等学历人员申请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所必须参加的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就采用这部书的体系及其内容作为传播理论部分的开考依据。事实上,这部电大教材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也与此书相近。

如果说,作为第一代贡献的标志是 1982 年的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作为第二代成就的象征是 1986 年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那么作为第三代崛起的契机就是 1993 年的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称之为契机,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次会议与上次会议相隔了 7 年,当全国的传播学研究者再次汇聚一堂时,人们发现第二代的大多数已风飘云散,硕果仅存者寥寥无几,而且大多也都处在“交班”的状态。二是自这次会议之后,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固定为两年一次,每召开一次新人就多出一批,等到 1999 年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时,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成为第三代的一统天下了。别的不说,全国已有的几位传播学博士生导师,几乎均为第三代学人。

当我们在世纪之初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之际,传播学的第四代是不是已如地火奔突、蓄势待发呢?作为受过第一代和第二代栽培滋养的第三代,我们在感念前辈的同时,怎能不热切期望新人的出现,期望他们把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按照历史的辩证法,我们深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每个人的一生能够做成一件富于创造性的事情已属不易。虽说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大家代为不绝,但一般人的创造力毕竟有限。对常人而言,“江郎才尽”不仅不是什么反常的现象,相反恰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的才情才华才智才思被挥洒殆尽时,为更年轻的一代让路就属明智之举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在这部传播学教材的前面写下这篇不似前言的“代前言”,既是对前人的感念,也是对自己的反思,更是对来人的瞩望。

李彬

2000 年 6 月于北京

# 目 录

代前言	(1)
<b>第一章 绪 论</b>	(1)
第一节 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	(3)
第二节 传播与传播学	(15)
第三节 传播学研究的演化	(23)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	(42)
<b>第二章 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b>	(53)
第一节 符号在人类传播中的作用	(55)
第二节 人类传播中的意义	(71)
<b>第三章 传播的过程与类型</b>	(81)
第一节 人类传播的基本过程	(84)
第二节 人类传播的基本类型	(101)
<b>第四章 大众传播</b>	(134)
第一节 大众传播的特点与社会功能	(136)
第二节 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	(148)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157)
<b>第五章 大众传播媒介</b>	(168)
第一节 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	(170)
第二节 传播制度与传媒控制	(183)
第三节 媒介规范理论	(191)

<b>第六章 大众传播的受众</b>	<b>(204)</b>
第一节 “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	(206)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受众观	(212)
第三节 受众行为理论——“使用与满足”	(218)
第四节 受众媒介观念	(223)
<b>第七章 大众传播的效果</b>	<b>(232)</b>
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及其历史	(234)
第二节 效果的形成和制约的因素	(241)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理论	(250)
<b>第八章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b>	<b>(269)</b>
第一节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	(271)
第二节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282)
第三节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重要课题	(298)
<b>第九章 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b>	<b>(309)</b>
第一节 大众传播研究	(311)
第二节 抽样调查法	(315)
第三节 问卷法	(320)
第四节 内容分析法	(327)
第五节 控制实验法	(332)
第六节 研究报告	(339)
<b>后 记</b>	<b>(346)</b>

# 绪 论

## ☞ 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

- ◆ 口语传播时代
- ◆ 文字传播时代
- ◆ 印刷传播时代
- ◆ 电子传播时代

## ☞ 传播与传播学

- ◆ 传播与信息
- ◆ 信息社会
- ◆ 传播学的性质与对象

## ☞ 传播学研究的演化

- ◆ 三大来源
- ◆ 四大先驱与施拉姆
- ◆ 两大学派

## ☞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

- ◆ 交往与传播
- ◆ 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

## 要点提示:

1. 人类传播活动的四个阶段及主要特征;
2. 信息、传播和信息社会等概念;
3. 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4. 传播学理论的三大来源;
5. 传播学的四大先驱与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主要贡献;
6. 传播学两大学派即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特征及差别;
7.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

什么是大众传播学? 大众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基本理论是什么? 它要解决什么问题? 学习这门课程有什么意义? 这些问题, 是每个初学者都会遇到的, 而本章即针对这些疑惑, 逐一进行解说, 算是为后面的章节提供一个导读。

本章讨论的内容, 涉及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历史线索的勾勒, 如人类传播活动的演化, 传播工具也就是本学科所说的“媒介”的进步, 以及传播研究逐渐形成一门当代显学的过程等等。理清了这条线索, 对大众传播学是怎么一回事, 它是怎么来的, 是干什么的, 大家头脑里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整体框架。二是基本概念的辨析, 这些概念虽然寥寥无几, 而且乍一看也平淡无奇, 但它们却构成了本学科巍峨大厦的基石, 如信息、传播、媒介、信息社会、大众传播等。大众传播学的一切探讨、一切理论、一切功用, 说到底都落脚在这些基本概念上, 所以把握它们至关重要。三是传播研究的概述, 包括传播学以及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领域, 不同的研究学派及其特征, 科学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等。总之, 搞清楚这些问题, 将有助于大家学习后面章节的内容。

## 第一节 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

清代大儒章学诚，在其历史哲学的巨著《文史通议》里，开篇就写下一句名言——“六经皆史”，意思是所有的学问都是历史。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前后相继的时间上展开的，传播活动以及对传播活动所做的理论研究自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这么说，大众传播学乃是人类传播活动演进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所以，让我们先从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讲起。

就其本质而言，人类传播活动是个社会信息流动的过程。如同物质的流动一样，社会信息的流动也得借助一定的方式如演讲，通过一定的渠道如网络，有时还得依托一定的机构如媒体进行，这些方式、渠道或机构在传播学里统称为媒介。媒介就是传播活动赖以进行的方式方法或工具手段，任何传播都离不开媒介，同样任何媒介也都服务于传播。由此说来，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历史，其实也就是传播媒介的演进历史。正是依据媒介的发生发展与变化变革，我们把迄今为止的人类传播活动划分成四个历史阶段：一是口语传播时代，二是文字传播时代，三是印刷传播时代，四是电子传播时代。“这个过程，是人类使用的传播媒介不断丰富历史，也是社会信息系统不断发达、不断趋于复杂化的历史。”〔1〕

### 一、口语传播时代

口语是人类传播所使用的第一个媒介，口语传播时代也就成为人类传播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状态而组成社会开始，一直到文字的出现。简单地说，就是从人类开口说话到用手写字这样一个漫长时期。美国学者威廉斯（F. Williams），在其《传播革命》一书里绘制了一个传播史表盘，直观地显示了这个时期在人类传播历史上所占的时间比例（图 1-1-1）：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8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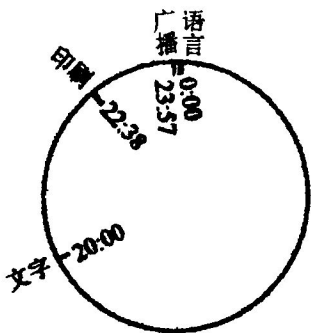


图 1-1-1

这个表盘上的 24 小时，代表着西方晚期智人即克罗马农人以来的 360 个世纪，故被称为“一天等于 360 个世纪”。在这个折射出人类传播活动历史全程的时间表盘上，从 00:00 的语言产生直到 20:00 的文字出现，都属于我们所说的口语传播时代，差不多占了这一天的 5/6。其余的 4 个小时里，文字传播时代约占 2 个半小时，即从 20:00 到 22:38 印刷的问世；印刷传播时代只有不足 1 个半小时，即从 22:38 到 23:57；至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电子传播时代，则仅限于最后的 3 分钟。口语传播时代的漫长，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这个传播史表盘，人类的语言出现在 36 000 年前。而事实上，对人类何时开口说话这个问题，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看起来也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答案。就像德国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所精辟比喻的那样，追问语言起源于何时，无异于追问儿童何时首次认出自己的母亲。而亚里士多德的描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他说，这同一支军队逃跑的情况相似，起初他们由于恐慌而逃跑，后来不知是谁停下来看看敌人是否还在紧追，最后发现危险解除全军终于都停了下来。这里，我们不能说全军是在某个士兵停步时停住的，同样不能说是由于另一个士兵的停步，或某几个士兵的停步而停住的。那么，这支军队究竟何时停住的呢？伽达默尔把它归结为一个“普遍性何时产生的问题”。<sup>〔1〕</sup>语言何时产生的问题也是如此。

关于语言的产生，至今人们能够比较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语言的

〔1〕〔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14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出现与社会的形成是同步发生的。因为所谓社会，无非就是人与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或联合体，其中第一位的事情就是彼此间的交往，也就是信息的传播。没有交往，没有传播，这个共同体就无法存在，更无法运行。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探讨国际传播的著名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里也曾论述道：

这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即传播——引者注）时刻发生、延续不断，其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在一个小小的社会单位范围内尤其如此。在过去，这种交流无疑有助于加强互相之间的友爱合作关系，以抗衡由于受制于外来势力而形成的分散局面。不管怎样，它总是起着一种社会化的作用：鼓励人们工作、协调群体生活、团结一致来和大自然作斗争，并促进作出集体性的决定。它今天仍然是人类交流中无以取代的一个方面。<sup>〔1〕</sup>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则把人类传播形象地比做“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黏合在一起的混凝土”<sup>〔2〕</sup>，更是生动地揭示了人类传播与人类社会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

当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须得借助一定的工具与手段，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媒介进行，而对人类传播活动来说，最便利最通用的媒介自然是语言即口语了。用列宁的话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种重要性即使在通信卫星上天、网络媒介入户的今天，也不曾有丝毫的减弱，对此我们只需设想一下电视里的人都不说话会成什么样就清楚了。另外，口语不仅是最初始、最重要的媒介，而且也是最基本的媒介。也就是说只有口语是独立的、自主的，其他任何媒介——无论是古代的烽火还是当代的网络，无不以口语为基础，都是口语媒介的变形与延伸。举例来说，文字仿佛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媒介，但实际上文字不过是口语的代表，是代表口语在表达，人们总是先有要说的什么话，然后才能写下来。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用过一个比喻，十分恰当地阐明了语言与文字的相互关系。他说，语言是货真价实的商品，而文字只是便利商品买卖和流通的货币。进而言之，除了文字其他的媒介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们只是不同的货币，代表的都是同一种商品——语言，用萨丕尔的话说：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多种声音，一个世界》，6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1。

〔2〕 [美] 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部译，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的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1〕

所以，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概括的，人实际上是有语言的生物。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就在于他能开口说话。

语言或口语的重要性虽然无与伦比，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口语只能直接依靠人体自身的发声功能，于是人类的传播活动便在空间距离上受到限制；而由于口语随说随逝，除了依靠人们的记忆就再也无迹可求，于是人类的传播活动又在时间距离上受到限制。在小国寡民的时代，在一个生活原始的社会，这些限制并不构成什么障碍。而随着人类文明的日趋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信息系统的日趋复杂，仅仅依靠口语媒介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交往的现实需要，于是一种新的媒介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文字。

## 二、文字传播时代

文字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它标志着人类传播活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从文字的发明延续到印刷的兴起。

文字是继语言之后的第二种媒介，它的发明使传播活动和人类社会发生了意义重大的突破。如果说语言的出现，使我们的祖先最终实现了从动物到人类的转变；那么文字的发明，就使人类社会得以实现从原始到文明的飞跃。没有语言，“人类”就只能生活在动物世界；没有文字，社会就只能停留在原始水平。一句话，语言是人类的证明，文字是文明的标志。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里写道：

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文字发明，是文明发展中的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它使人们能够把行政文献保存下来，把消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也就使中央政府能够把大量的人口组织起来，它还提供了记载知识并使之世代相传

---

〔1〕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第 2 版，1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